

## 骏马奖作家观察(三)

在中国文学的多声部交响中，民族文学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声部。作为我国民族文学最高荣誉之一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自1981年设立起，至今已评选出十三届，表彰了一大批杰出的少数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，为当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。在历届骏马奖的获奖作品中，彝族作家群体凭借稳定的创作质地备受瞩目，冯良就是其中极富辨识性和代表性的一位。

在民族文学版图上，冯良建构起独特的凉山彝族文化坐标。从《彝娘汉子》《西南边》到《翻过瓦吉姆梁子》《凉山的人》，从文化寻根到现代性反思，冯良的彝族书写表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。她从个体的生命经验出发，在书写彝族历史和风情的同时，不断突破单一的民族书写，借由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接通时代脉搏，以更宏观、居间的创作视野描摹族群记忆，以强烈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重构关于凉山和彝族的想象，揭示出地方书写的开阔面向，成为民族文学当代转型的生动缩影。

## “远方是我的凉山老家”

2020年，冯良的长篇小说《西南边》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。小说以20世纪50年代的凉山彝区为背景，通过讲述三代彝汉青年的婚姻故事和日常生活，切入彝族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，还原出亲族乡情的现实嬗变，以及外部世界与彝族社会丰富的互动细节。目前，围绕《西南边》展开的个案研究已初具规模，但这部作品之于冯良创作轨迹的标志性意义仍待进一步阐发，需要结合冯良的创作历程予以整体性考察。

冯良出生于四川凉山喜德县，而后离开家乡前往北京读书，1984年大学毕业后入藏，在西藏工作生活15年，后定居北京。冯良的文学创作发轫于西藏时期，她以藏地题材的散文和小说崭露头角，《西藏物语》《情绪》《秦娥》等都是属于藏地题材的作品。冯良的早期创作更多属于他者视角下的文化发现，难免带有文化猎奇的痕迹，但她对民族文化表征的敏锐感知，对多元文化碰撞的深入思考，以及作家皮所指出“对其所描绘的一切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不是居高临下的，也不是身心投入的，而是介于两者之间”的居间性视野，都为后来的跨文化书写积累了经验。

从散文集《彝娘汉子》(初版于2005年，2022年增补版更名为《凉山的人》)开始，冯良的创作母题逐渐回归并聚焦彝族本土书写。虽然离开凉山40余年，但她未曾真正远去，在文学书写

温新阶是改革开放后从鄂西成长起来的土家族作家，长期致力于散文创作。近年来他创作了一批精短散文，从传统与现代、历史与人文等维度对乡村振兴、山乡巨变予以抒写，所做的探索令人印象深刻。

**植根巴土大地的民族文化。**温新阶的散文题材主要来自巴土大地，无论是对民间文化的开掘，爬梳史料、唤醒民间传说，还是写这片土地上的某个人、某件事，悠长的巴土文化都是酝酿他歌咏的土壤。他敏锐地感受到巴土文化基因的内在涌动，在传承中创造性地加以转化，赋予传统文化以全新的时代精神。如山歌是土家族流传颇久的民间文化，出嫁要歌，丧鼓要歌，田间薅草亦歌，乃至任何一个习俗都可以歌。温新阶在散文中大量运用山歌，如《哭嫁歌》的“姊妹亲，姊妹亲，捡个石榴平半分，打开石榴十二格，多年的姊妹舍不得”，《薅草锣鼓》的“早晨早，早晨早，路上碰到花大嫂”，直白明了的山歌构成了他的从小耳濡目染的文化氛围，当它们成为散文的内在底蕴和抒写对象时，便使得他的散文有了与众不同醇厚感。

**激活巴土文化的人文资源。**面对巴土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红色资源，温新阶倾力发掘其新内涵，对历史、自然、人物进行持续细致开掘。他写当代人物，也写古代人物，写真实人物，也写传说人物，由此勾连起历史和民俗和当下。在散文集《夷水之涓》中，他以深深的悲悯叙写土家人的历史苦难，李勤、李子骏、陈泽南、李步云等一批红色先烈，用鲜血染红了清江，激励后人奋勇向前。在散文集《古镇瓷丘的悠悠岁月》中，面对巴土文化热土，他从历史、自然、人文等角度，钩沉古镇的历史沿革，打捞这片红色土地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扫描瓷丘的历史名人、当代学人、文化传人等，寻找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联系，激活文化资源，鼓舞人们热爱家乡、建设家乡。

**致敬普通人的奋斗之光。**新时代以来，温新阶的散文创作在题材、风格、笔法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转变，在由写景抒情向写人叙事的推进过程中，山乡普通人的生活成为他叙写的着力之处。他热衷于写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比如《草本乡村》中，有玉秀姐和开德在野葛花中的爱情，有母亲对遍地开放的洋芋花的钟爱。《村人三题》中，大半辈子为生活奔跑的刘维菊，赤脚医生李兴成的传奇艺术和退休后的快乐人生，打小残疾、人生曲折却坚强的曹文阶，从不同侧面折射了时代风雨与希望之光。随着山乡巨变的推进，他的笔触转向活跃在乡村建设中的支

## 山乡巨变的多维透视

## ——简谈温新阶散文的新时代抒写

□凌春杰

部书记、民俗艺人 and 致富能人等群体，他们构成了山乡巨变的叙事主体，是这个时代极具活力的主人公。他总是用饱含深情的细腻笔触，抒写他们平凡生活的缕缕光亮，生动展现他们的人性和人情之美。

**讴歌山乡巨变中的新生活。**在温新阶的视域中，除了传统的历史文化风物被他反复打量品味，新时代所呈现出的新生活形态，如直播带货、观光农业、山村民宿、高山避暑等，也成为他的关注焦点。正在展开的新生活形态将城乡进一步联接起来，他用温暖的笔触描摹出有源有流的新山乡风物，不遗余力地将传统文化融入山乡新生活，勾勒出山乡巨变中人们的鲜活与明亮。散文《故乡木瓜花》中的木瓜花，如今成为观光农业景观，数以万计的木瓜花从眼前铺向山边，成为花的海洋，让城里人为之倾倒，喜悦也洋溢在村民脸上。《古树下的村庄》中的古树广场不仅见证了历史，也见证了今天，还将见证未来：在村庄的深山中，人们发现了一座废弃几百年的石板屋的史学价值和美学价值，未来将链接起无数新的可能。着眼山乡巨变中的变化，对山乡新生活倾情抒写，成为温新阶的新选择。

**映射对故土的深沉热爱。**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，温新阶进而获得了看待乡村的全新视野。他满怀喜悦地行走乡间，文学想象不断得到激发，乡村的点滴变化都令他欢欣鼓舞。他写家乡的村庄，门前的小河、屋后的山林、周围的房屋、田间土地和村里乡亲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，这正是时代前行的方向。他用在一村一户、一乡一县中眼见的真实，描绘出当代乡村灵动温暖的画卷，表达对故土的深沉依恋。在散文集《一抹春色》中，他用亲历视角描写鄂西山村在生活形态、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变迁，全景式呈现鄂西山村的人文图景，赤子之心可触可感。由是，他先前不断回望故乡的焦虑，在与时代的共同前行中，得到了纾解与释然。乡村建设的生动情境，还催动他将乡愁转化为建设家乡的热情，将文学融入美丽乡村建设，为乡村振兴鼓与呼。

作为从大山中走出的作家，温新阶最能体会近年来山乡发生的巨大变化，他新近的一系列散文通过对山乡巨变进行多点透视，对山乡巨变语境中人的精神予以召唤，字里行间洋溢着浓烈之爱，全面呈现了山乡巨变中的新样态，给读者带来新的艺术体验。(作者系土家族作家)

## 居间视野与边地想象的新质

——冯良创作论

□田丽媛

冯良的文学实践昭示着民族文学的使命所在：要有深扎文化根脉的定力，守护珍贵的地方性知识，更要激活传统的当代性价值，使其在不断的再创造中获得流动式发展，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

中一次次精神返乡。在骏马奖获奖感言中，冯良如此说道：“但纵然时空相隔，凉山都不曾离开我哪怕须臾，她是我生命的缘起、情感的依托。岁月流不走的记忆、前行的脚步，那些深怀冷傲、倔强，却掩不住奔放、幽默的族人，无论彝族、汉族，还有他们的人生，带着大时代巨变的深远回响，那激荡的、传奇的、英勇的、赫赫声名的、深情的，还有机智的，甚或狡黠的，何其珍贵，犹如珍珠。”凉山不仅是冯良的灵感源泉，哺育和滋养了她的文学创作，更是她情感、记忆和思想的凝结，成为被唤醒和塑造的地方形象。悲壮的英雄故事、浓郁的宗教色彩、古老的丧葬仪式、害羞的民族性格以及复杂的文化身份等跃然纸上，这些都是冯良融化在血液中的原乡记忆，也是民族文化史与个人生命史交相辉映出的历史真实。正是在对凉山的回望和怀想中，冯良精雕细琢出凉山族人的群像，串联起全景式的彝族文学地图，继而实现她对族群记忆和民族认同的建构。

《西南边》不仅是冯良文学成就的象征，也预示着她从文化寻根到现代性反思的创作转变。近作《翻过瓦吉姆梁子》的问世则标志着这一创作转变的完成。相较于《西南边》波澜壮阔的跨世纪民族历史变迁，冯良在《翻过瓦吉姆梁子》中更加聚焦于个体命运，通过阿合和史尼的故事，展现彝族青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处境和精神追求。这部作品延续了冯良挖掘彝族“美好”的意旨，通过破除长期以来对于彝族闭塞、落后的陈旧印象，描绘出全新的彝族文化样貌。

## “轻手轻脚让语言生长”

怎样发掘民族文化的斑斓而不囿于民族文化？如何突破远观和猎奇，将遥远的异质的故事转化为打动人的叙事？这是少数民族作家们必须面对的写作难题。阿来认为，不同于“写作者先明确身份，又观念文化，再渲染审美”的边地小说范式，冯良取而代之以“从从容容写人、事、生活。认认真真倾听他地说话的声音，轻手轻脚让语言生长，长出人、事、生活、情感，以及驳杂的血缘和丰富的文化”。从从容容、认真求真、轻手轻脚，正对应着冯良理性、诚实和温情的写作态度，也构成了冯良作品的张力。

理性源自冯良个体性的生命体验和知识经验。“彝娘汉子”的血缘赋予她“团结族”的身份，也造成了复杂的民族意识和归属困境。在散文《彝娘汉子》中，冯良介绍了自己彝汉混血的身份，并对这种身份造成的尴尬进行追溯，比如受到小伙伴们各种暗讽。这种身份意识的撕裂，使冯良



在困惑与追寻间孕育出多层次的文化认同。而在凉山、北京、西藏等地的成长生活经历，则丰富了冯良的认知和经验，使她形成宏观叙事和微观烛照相结合的表达格局，于是冯良得以从容不迫、不慌不忙、不动声色地为彝乡书写灌注多元色彩。

诚实植根于自己的原乡记忆，是冯良书写故乡传统时的文化冲动和情感释放。评论家张莉认为，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具有诚实抵达所写之物的特点：“她们有丰富的生活经验，愿意去细致描摹生活的枝丫角落，不需要叙事的花哨，就能描写出事物本真的光泽。”从这一角度而言，冯良无疑是对接现实的写作者。她敏锐地捕捉到了“那些在汉彝文化夹缝中生长出来的蓬蓬叶片”，善于吸收“彝话”“川音”中的意象和腔调，将其转化为汉语文学的表达。这种语言转换不是简单的翻译，而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再创造。例如《凉山少年》中对丧葬仪式的描写，冯良将彝族文化经验转化为具象可感的生活细节：“妇女会取出随身携带的盛装，百褶裙，绣花的上衣、马甲、帽子，银饰，最起得换上一件绣花上衣，男子的标配是山羊毛织的披风，彝话叫‘擦尔瓦’，一般都搭在肩头，斜在身体的左边右边，尺长的穗子晃悠在小腿处，行走无碍。”她将彝族的风俗传统引入，使边地经验进入主流审美视野，让乡音乡貌乡情拥有力透纸背的鲜活感。

血脉温情里糅合着冯良对故乡的乌托邦式想象。爱与善是凉山彝乡赠予冯良的宝贵情感资源，当生存足迹变动不居，各类文化元素冲突交织，故乡所葆有的原初与本真自然就成了精神的

向往。对于年少的冯良而言，远方是一种模糊又美好的想象，这种想象会追随离乡族人的脚步无限延伸，而当凉山成为精神纽带所联结的故乡时，“远方是我的凉山老家，她清晰而美好”。于是我们看到，冯良笔下的族人有着可耐岁月冲刷的本真善良的底色，哪怕世事变迁，也会有温情流露。冯良尤其擅长通过多重视角展现文化冲突的复杂性，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，让人性的光辉在更广阔的空间绽放。

## “翻过瓦吉姆梁子眼界宽”

凉山是冯良情感的依托，是她书写的内动力，在关于凉山的反复书写中，冯良也表露出对这块高地的强烈使命感。从《凉山少年》的文化寻根和《彝娘汉子》的身份危机，到《西南边》的史诗建构和《翻过瓦吉姆梁子》的现代性反思，这条创作轨迹不仅记录着冯良的创作精神成长，更映射出民族文学从文化自觉到主体建构的演进历程。

在冯良的文学地图中，“瓦吉姆梁子”是一个充满隐喻意味的文化符号。这座横亘在昭觉与喜德之间的山梁，成为承载多重意义的意象：如瓦吉姆梁子一般的列列山峦，是凉山与外界物理空间的区隔线，也是彝族与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的连接带。它们是彝族古老传统的守护者，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明的瞭望塔。《翻过瓦吉姆梁子》中主人公翻越山梁的旅程，隐喻着自我和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，地理屏障由此转化为精神坐标，展现出作家重构边地想象的文学使命。

## 构筑温暖光明的世界

——谈刘平勇系列小说

□刘永松(白族)

刘平勇的小说创作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温暖而光明。这种温暖和光明不是直抒胸臆式的，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感染读者。他的小说常采取以小见大的方式进行构思和创作，代入感强，令人觉得亲切，读来轻松。他的“小”可以概括为“小切口”“小人物”“小细节”“小生活”，但这四个“小”却能构筑出温暖光明的大世界，刊登在《光明日报》上的系列短篇小说《清水沟人家》《婚房琐记》《拐角处》《月光》即是如此。

刘平勇写作时善于找到独特的“小切口”，切口虽小，却溢满温暖和希望。如《清水沟人家》以“家住清水沟的85岁母亲打电话告诉儿子，村口的杨三爷走了，要儿子无论如何回去一趟”开篇，“村口的杨三爷”说明他和“我”并无亲戚关系，母亲却让“我”无论如何回去，人情味儿令人温暖。作者由此展开对时代之变的书写，写出杨三爷的一生，写出高寒山区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变化。在落后贫穷的时代，邮差为了送一封信，要走40里山路，还得在送信人家寄宿一晚；如今可以坐飞机到市里，再坐公交到村里，路全是柏油路，房子都是小洋房。70年代，村里只有杨三爷一个识字人；几十年过去，清水沟有了全市最具代表性的农村书屋。山村人民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巨大变化，让人们对生活充满希望，并且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。小说处处充满温暖意蕴，比如邮差为了给“我”家送信，翻山越岭，“我”家为了感谢他，拿出最好的饭菜招待。邮差感动之余，信封、邮票都不收钱，还时不时给“我”买作业本和笔。一个朴实善良的邮差，身上的闪光令人感动。

《婚房琐记》从表哥要还“我”30年前借的680元钱入手，“小切口”一拉开，背后是30年的时代变迁，是一代人的生活变迁。30年前，“我”住着12平方米的婚房，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，女儿出生后，一家人蜗居在小房子里艰难生活。从在外租房改善生活到两次买房，作者用房子的变化写出时代的变化。老百姓随着改革开放过上了富裕的生活。表哥当年给即将结婚的“我”免费打家具，但在快完

冯良重构边地想象的写作之旅，离不开她的居间性视野。这种居间性体现为历史见证者与文化阐释者的双重身份。作为凉山的女儿，她能够以整体性视野观照彝族的前世今生，作为民族文学作家，她又能以现代眼光审视文化要素的当代价值，并且以社会史的精神，无限贴近平凡人物。尽管有文化失传之隐忧的流露，但也传达出对时代变迁之必然的理解。这样的叙事立场超越了单一的文化怀旧或激烈批判，转而以动态平衡的视角探索传统的现代性转化，冯良的作品因而获得独特的阐释张力。

如今的冯良，进一步深化着她对彝族命运的思考。面对混杂的身份意识、激烈的多元文化冲击和加速的现代化进程，冯良植根于彝族优秀文化的土壤，更自觉地居于边地和中心之间，以一种客观、冷静、不动声色的视野，审视彝族文化的来路与去路，探索多元文化耦合共生的叙事新路径。以《翻过瓦吉姆梁子》为代表的近期作品，不仅还原了凉山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中的阵痛，也展现出文化转型的复杂肌理。但文化冲突只是表层困境，文化适应问题也只是走出凉山的彝族青年所面临的众多问题之一。冯良的现代性反思仍在进行之中，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之间，还有开阔的文学语境等待她去开拓与探索。

冯良的文学实践昭示着民族文学的使命所在：要有深扎文化根脉的定力，守护珍贵的地方性知识，更要激活传统的当代性价值，使其在不断的再创造中获得流动式发展，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(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)

从没享受过好处，唯一一次事先声明，还是被人霸占。读者由此产生共鸣，想象是何人如此自私。结果出人意料，那个霸占拐角处的人竟不承认，当他知道写在拐角处那些字的意思后无比自责，收起苞谷并向父亲道歉。而愤怒的父亲知道真相后自觉过分，第二天把拐角处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专门去帮那人背苞谷来晒。一系列矛盾冲突，折射出满满的温暖。

注重“小细节”的描写，对刻画人物性格、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有着重要作用。“我发现我爹和我妈的饭碗里只有半碗饭，他们吃得很慢，给自己夹肉的时候，只夹了一点点，然后放在嘴里老半天咽不下去。这跟他们平时吃饭完全相反。”这个细节出自《清水沟人家》，写的是父母招待邮差和杨三爷时的情景，既写出了家里的窘迫，也写出了父母的善良。小小一个细节，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一对善良农村夫妇的形象，展现出这类人共同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善良淳朴。

“小生活”指的是那些平凡简单的日常生活。《婚房琐记》里的借钱还钱，以及表哥为“我”打家具的故事，都是平常人家的平常故事。《拐角处》围绕父亲要把人家晒在拐角处的苞谷丢掉这件事展开，《月光》围绕父亲去人家新盖的房子做客这件事展开，《清水沟人家》写了70年代邮差送信到“我”家以及杨三爷到“我”家代写信等日常小事。每篇小说里的生活都是日常化的，让人觉得亲切。作者通过这些“小生活”来反映大时代，反映千家万户共同的“大生活”，这些“小人物”身上的共同情感，构筑起一个五彩缤纷的温暖世界，其间弥漫着希望的火光。

综上所述，作者正是通过“小切口”“小人物”“小细节”“小生活”，呈现出不平凡的大世界，这个大世界里有大时代、大情感、大世界，还有大爱、大温暖。走进这个温暖的世界，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美好，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因此变得轻盈灵动、充满诗意。

(作者系云南财经大学教授，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“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从口头传统向书面创作转型研究”23BZ184阶段研究成果)